

19 世 纪 的 湖 北 教 案

萧致治 萧 莉

(一)

利用宗教为侵略中国服务,是欧美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远在明末清初,随着殖民侵略者的东来,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如何大化、穆迪我、费乐德等就来到湖北,建立起湖广教区。18世纪初,清朝康熙、雍正皇帝连续发布禁教令,禁止西方传教士在内地和沿海传教,将传教士一律遣送出境。许多传教士不服从禁令,转移到偏僻山区继续从事传教活动。据说,当时武昌、安陆、襄阳等地在传教士的带领下,就有几百名教徒相继转移到谷城木盘山区的茶园沟隐居。经过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用炮舰作后盾,加紧向中国内地渗透,教会势力在湖北得到迅速扩展。

鸦片战争前,天主教系统的传教士在湖北活动了约两百年,在谷城等地已奠定一定基础,现在又有不平等条约作护符,教会势力发展特别迅速。19世纪50年代建立了湖北教区。1870年后,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他们又把湖北教区划为三个教区,即以武昌为中心的鄂东教区,以宜昌为中心的鄂西教区,以老河口为中心的鄂西北教区。后来,鄂东教区又分为汉口教区(辖汉口、黄陂、孝感、云梦、应城)、汉阳教区(辖汉阳、沔阳、天门、潜江、京山、钟祥、汉川、洪湖)和武昌教区(辖武昌、咸宁、鄂城、大冶、通山、兴国)。据统计,到1920年,仅鄂西北教区就建有145座教堂、315个会口,拥有33700多名教徒^①;武汉三镇在20世纪30年代有天主堂会所13处,教会学校及神学研究院12所,教会医院3个,印书馆一个,教养院、育婴堂9所,教徒10多万人(可能有夸大)^②。

基督教(新教)来到湖北较晚,教会势力的发展也很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被开放为通商口岸。1861年6月,传教士威尔生和杨格非即奉伦敦传教会的指示,迅速从上海赶到汉口,开辟新的传教据点,这是基督新教来到湖北的第一批传教士。威尔生到汉口后仅一年多就去世了,杨格非则以汉口为中心,在华中地区从事传教活动达50多年。他在汉口站稳脚跟后,在英国领事和外国商人的帮助下,很快又在非开放的武昌建立起传教据点。汉口洋商还集资购买了一条船,专门供他在长江和汉水两岸从事传教和侵略活动。50多年间,他在华中各地建立福音堂共百余座^③。继杨格非之后,基督教的其他教派如圣公会、信义会、循道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等,都纷纷派遣传教士前来湖北,在湖北广收教徒,发展教会势力,其足迹遍布湖北的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在各地建立起号称“传播福音”的福音堂。仅武汉一地,就有基督教系统的教堂会所40处,医院3个,学校20所^④。

传教士来到湖北,口口声声“劝人为善”,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却不怀好心,在各

地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庇护教民，欺压群众，干出了种种罪恶勾当。

首先是强买、强占土地，抢夺百姓生计。天主教传教士在湖北各地，常常凭藉权势，运用各种手段，强买别人土地。据笔者1972年在襄阳地区调查，天主堂在鄂西北各县均占有不少土地。光化县有七区一镇，每个区镇都有天主堂的土地。老河口东门外直到仙人渡，上下30里，沿襄河的土地都被天主堂所占有。据有人估计，天主堂在光化、谷城两县占有的土地就达万亩以上^⑤。在贫瘠的谷城沈垭一带，占有土地700多亩，为当地稻田面积的2/3以上。他们常常用挑拨手段夺占人民土地。沈垭人民控诉说：“天主堂看中了谁家的田，就挑动别人和这家打官司，搞垮人家。人家因打官司要卖出，天主堂就买过来，……而且要按天主堂定的价出卖”。光绪年间，传教士以陈立端反对天主堂为罪名，迫使地方官将陈家160多亩土地充作天主堂公产^⑥。

1860年后，传教士还根据《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的规定，在各地掀起“还堂”案，任指公堂庙宇为天主堂财产，强行霸占。如意大利神甫与圪州汉奸地主勾结，“强占五百寺地产，拆毁香烟繁盛的古庙，修建教堂；霸占田地，雇工或租佃与人耕种，交纳租谷时100斤只折算60斤，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不满”^⑦。又如1870年，传教士勾结乡绅地主，在谷城沈家垭子霸占了胡姓土地20多亩，用来修建大经堂和盖造住房。这类事，其他州县也有发生。湖北各地人民对他们霸占和强买田地，抢夺自己生计，无不恨之入骨。

传教士霸占了大量土地，除用于教堂、住房和一些“慈善”机构的建筑外，其余大量土地都是租给佃农耕种，并且强迫他们缴纳重租，至少是对半分，有的要缴六七成。种地主的地，地面上的果树如柿树、核桃树都归佃户；种天主堂的地，连柿树、核桃树也要归他们，此外，每年还要致送鸡、鸭、鱼、肉等实物，恨不得把人民辛勤劳动的财富搜括得一千二净。这种竭泽而渔的剥削，往往是激成教案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发放高利贷以及利用宗教仪式进行剥削。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开初主要依靠各国政府拨款和来华经商的外商捐助，后来逐渐直接从中国榨取。榨取之法除地租外，就是发放高利贷、经营房产和商业活动，从中获得大量的不义之财。光化老河口有一条仁义街，共有房屋上千间，全部房屋都是天主堂用来出租的房产。他们发放高利贷，利息很重，“每四个月一转，利上加利。最厉害的是天主堂专门引诱有一定家产的业主的未成年的继承人借债，暗地规定户主去世时，偿本还利。群众称之为‘锣钹响利钱’（人死了，祭亡灵要用锣和钹送葬，故名）。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⑧。美国最先到达光化老河口的基督教传教士劳格物，经常找商号放高利贷，“仁义信”大绸缎店的经理，由于还不起劳格物的债，竟被他封了店门，并把该店抄掠一空，使之因此破产^⑨。

除了直接放债之外，天主堂还利用各种宗教仪式，巧立名目，大肆搜括农民的钱财。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教徒都要捐献一定的财物；结婚要交婚配钱，求“炼狱灵魂”要交炼狱钱，请神甫念经要交经钱，逢传教节，每户要交粮食30斤。他们以各种借口搜括百姓，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骂他们是“洋债主”^⑩。

第三是包揽词讼，庇护教民，欺压百姓。传教士到中国后，倚势压人，任意干涉中国内政，包庇教民，“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平民与教民）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⑪。由此，教会成了一些为非作歹、游手之徒的庇护所。从而，“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久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⑫。这些教民依恃教会作奸犯科，欺凌平民百姓，遇有民教诉讼，地方官屈于洋人压力，“扶教抑

民，良民积愤填胸，教案叠出”^⑬比如随州，本是教民争产，竟反诬武生李日三“驱逐教士，抢劫教民”，而且还通过洋教士控告到德安府，致使李日三一再遭到陷害。李愤而到教民家说理，又被诬为“统兵抢劫”，既赔款，又坐牢，沉冤莫伸^⑭。这类事件，各地不时发生，地方官一味迁就了事，百姓有冤莫伸，“始而抱怨，继而成恨，终且成仇”^⑮，教案就这样接二连三发生了。

第四是收集和刺探各种情报，充当资本主义侵略湖北的急先锋。传教士来到湖北，尽管也有虔诚的教徒，但不少人名义上是传教，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侵略湖北的坐探。他们在哪里传教，就把那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情报收集起来，用书信与报告书形式寄回本国，供该国侵华参考。如沈垭天主堂的传教士曾窃取清朝密谕，寄往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又如湖北各地有什么特产，各地的形势民情等等，都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将情况调查收集后，寄回本国的。难怪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曾直言不讳地说：“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所作的努力，对于我国利益是非常重要的”^⑯；美国国务卿斯汀生也说：“我们对中国的最普通的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⑰。可见，传教士在资本主义侵华中的重大作用，即使侵略者也是从不讳言的。

正是由于传教士在湖北作恶多端，引起群众的广泛不满和愤怒，湖北人民忍无可忍，才纷纷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二）

19世纪的湖北教案，开始于60、70年代，到90年代形成高潮。

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以传教布道为名，深入城镇乡村，兴建教堂，劝导和引诱人们入教。各地群众对陌生洋人到来，惊惶不安，谣传四起，以致民教冲突在各地时有发生。

早在1869年，传教士赴天门传教，立刻发生了“天门教案”，这是近代湖北境内发生的第一起教案事件。传教士到了哪里，就把十字架插到那里。群众见了以后，往往产生种种疑虑，千方百计要除掉这个“不祥”之物。为此，各地不时发生树、拆十字架的斗争。1870年，天主堂霸占房、谷交界的高山玉皇顶，改为十字山，当地群众立刻掀起反强占斗争。1876年，谷城涨潮铺保正刘正起，由于害怕本地因此被征服，在一个深夜率领群众把树立在玉皇顶上的十字架推倒，传教士毕占礼认为是触犯了“圣物”，立刻和谷城县官府勾结，强将十字架再次树起，并将刘正起等多人逮捕入狱。后来，刘正起变卖了全部家产，才得赎出。同年2月2日（正月初七日），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偕同教堂医士马根知前往孝感魏家湾，准备以替人治病作为诱饵，诱骗群众入教。当他们走到离魏家湾尚有五六里的周家河时，附近群众把洋人下乡视为奇事，纷纷前往围观，并企图阻止他们前进，儿童乘机向他们投掷泥团土块，以致杨格非和马根知均受了微伤，被迫退回汉口。事件发生后，杨格非要求“从严究惩”^⑱。江汉关李监督经过查访，得悉“此案肇衅之由，实因正月初各处村庄拜年人多，乡民见闻不广，初见外国服饰之人入境，以为稀罕者”，因此前往“观者如堵，该教牧遂疑为围拥欺侮。当聚观之时，幼童拾取土块，互相抛掷为戏，因而误及该教士医生，以致杨格非面颊受有微伤，实亦事所难免”。案情调查清楚之后，江汉关监督最后以“失察子弟非为”之过，将张新春等给予笞责，以为警戒。后来，英驻京公使威妥玛亦照会总理衙门，只要保证“嗣后断再生事端，此案即就此了结”^⑲。当时由于双方均持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案情遂和平了结。

孝感打伤杨格非等事件刚刚过去，武昌又发生了林、卫二牧师被殴案。1877年7月11日

(六月初一日), 居住武昌的传教士林牧师路过阅马场, 正值湖北各地前来应试的武生在场演习射击, 兵勇也在场操练。他们看到洋人经过, 即有二三百人追赶观看, 群众中有人对林牧师投掷石块, 有人拳头相加; 林牧师的牙齿被打掉数枚。教堂卫牧师闻讯, 前往救援, 在街上亦被群众打伤右肋骨和左臂。事件发生后, 清朝当局赔银五百两作为医药费和教堂公费, 拿获应试武童程茂楼等八名, 带回管押销案^{②0}。

综观70年代湖北各案, 都是由于偶然因素引起。当时资本主义势力刚入湖北不久, 群众对西方传教士还很陌生。民教之间发生冲突, 有些纯是出于误会, 有些则是因为憎恨洋人擅自入境。这些反抗既无组织, 也无领导, 纯属自发性质, 规模不大, 影响甚小, 案情均很快了结。

到了90年代, 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湖北有了很大发展, 继汉口开放之后, 沙市、宜昌也相继开埠, 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开始深入农村, 洋纱、洋布等猛烈冲击着土纱土布等本地土产, 农民生产的土特产被作为原料低价收购, 人民群众处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 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把这些苦难都视为洋人带来的。因此, 他们对出没于城镇乡村的洋教士无比愤恨。这种愤恨情绪很快汇合成反抗怒火。整个90年代, 反教会侵略斗争在湖北各地此起彼伏, 连绵不断。

90年代最早的湖北反教会斗争是鄂东广济“武穴教案”。1891年6月5日, 天主教民欧阳理肩挑幼童四人, 经过武穴街外, 声言将送往九江教堂。当时早就有教堂将儿童剜眼剖心的传闻, 郭六寿、戴鲇鱼等眼见又有四个儿童送往教堂, 以为武穴教堂即是收养幼孩之处, 乃聚集多人, 奋起将教堂烧毁, 并打死洋人2名, 打伤数名。湖广总督张之洞急派水陆兵丁前往弹压, 拿获戴鲇鱼、郭六寿等10人, 判处郭、戴二人死刑, 其余八人分别治罪, 教堂由官府代为修复, 另外赔款65000元结案^{②1}。

武穴教案尚未了结, 鄂西又发生了“宜昌教案”。同年9月2日, 宜昌府城外的法国圣母堂收纳了游姓被拐幼孩, 群众因此更相信教堂残害儿童之说, 并见堂内有瞽目小孩数人, 更认为教堂残害儿童不假, 呼喊入堂查验。隔壁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听见呼喊声, 居然向群众开枪, 打伤一人。数千群众怒不可遏, 奋起烧毁美国圣母堂等教堂三处, 英商住宅三所, 甚至连正在建筑中的英国领事署也打坏了。事件发生后, 英法美等九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各国军舰开到汉口、宜昌, 进行武力威胁。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 以判处朱发金、赵宗雅等12人徒刑, 赔款164996两多银子了结^{②2}。

1892年, 麻城宋埠地方, 因为瑞典传教士梅宝善、乐传道捆殴教民, 激起公愤, 群众将他们殴打致毙。瑞典上海总领事柏固, 提出办犯、抚恤、参办麻城知县、宋埠设立教堂等四项要求。张之洞特委候补知府裕庚前往查办, 按照互殴致毙例, 判绞监候一人, 赔款45000元结案^{②3}。在这前后, 谷城发生焚毙教民雷财义之母案, 襄阳发生焚毁杨岗教会学堂和教民房屋案, 谷城紫金洞、襄阳茨河等地教堂均被焚毁。1895年, 谷城将军坪陈立端等又率众推倒十字架。各地教案层出不穷, 清朝湖北当局叫苦不迭。张之洞惊呼: “湖北民情不静, 处处与教堂洋人相齟齬, 自近年揭帖之风大炽, 动思生衅, ……多方弹压, 防不胜防”^{②4}。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1898年, 宜昌、恩施两府受四川余栋臣起义的影响, 又爆发了群众反教会斗争。这年9月下旬, 施南府属利川县川楚交界地方有众数百人, 打出余栋臣旗号, 烧毁野茶坝、李子壩等处教堂、育婴堂, 焚掠教民房屋; 10月中旬, 长乐(今五峰)教民刘义教在教民毕开榜的唆使下, 强逼妻子离婚。群众愤而将毕杀死, 并且烧毁了教堂。斗争很快扩大到长阳、巴东等县, 杀死比利时教士董若望及教民数十人, 烧毁教堂多处。这次斗争以

向策安为元帅、李策卿为军师、李少伯为副元帅。他们到处张贴告示，招聚人马，长乐县渔阳关李清臣等闻风响应，十来天发展到二三千人，打着“灭洋”旗号，率众四出，分扰三县。10月18日，攻克长乐县城，擒住知县苏貽英等官绅多人，并突进至湖南石门县子良坪焚教堂，准备直扑宜昌府城，然后由巴东、建始挺进四川与余栋臣会合。在这同时，吕守蛟在长阳资丘、颜敦五在石滚墙等地各拥众数百，与向策安相呼应。汉口法领事、宜昌英领事屡次照会湖北当局，吁请保护。张之洞急派候补知县朱滋泽总办恩施两府镇压事，派副将吴元恺带勇两营，副将刘恩荣带勇一营乘轮驰往，在各路清兵和地方乡团的围剿下，吕守蛟、颜敦五及李清臣的兵力被击散，向策安壮烈牺牲，部众百多人被杀，李策卿、李少伯等不知所终^②。

1900年，北方各省义和团反帝斗争蓬勃兴起，湖北受其影响，各地也纷纷开展了反教会斗争。这年7月3日，圻春群众纵火烧毁了五百寺天主堂，毁坏教民房屋80余家，最先燃起了反侵略烈火。仅仅过了7天，黄梅群众又纵火烧毁胡世柏天主堂，焚毁抄没教民41家。7月11日，广济县田庆二天主堂被武生张兰亭率众举火焚毁，拆毁教民房屋20多家^③。与此同时，地处鄂西北的襄阳反教斗争也接二连三发生。成千上万的愤怒群众在绅士朱广林等支持下，不到两个小时，就将东部黄龙荡教堂扒毁；襄阳城内外的居民则在知县李祖荫的支持下，将襄阳福音堂和电报局打得稀烂；此外，还有陈立端兄弟率众200多人，围攻沈垭天主堂，枣阳有群众百余人，大张“顺清灭洋”旗帜，掀起反洋教斗争，武昌城内人民也奋起打毁了城内两座教堂。在1900年内，湖北境内发生的反教斗争共达八起之多，足见民教矛盾在湖北激化到何种程度。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斗争高潮虽然过去，反教斗争并未停止。1904年6月初5，法国天主堂主教德希圣率同教士德希贤、董明德（均比利时籍）并带领教民贾澄清等前往恩施县沙子地游览，路过花背地方，福音教民向元新欲看德主教，贾澄清喝令退避，并打了向元新一巴掌，彼此因而争闹起来。向姓户首向元锡找德希圣主教求情。德主教令向元新备办酒席8桌，放鞭炮6万，作为赔礼道歉。初7日清早，德主教正准备起程，贾澄清忽然又说所放鞭炮尚未足数，勒令补放。群众对贾澄清横行霸道十分不满，愤而将德希圣、德希贤、董明德及教民贾澄清等7人一并杀死，并放火烧了李家炳等三家的房屋。事情发生后张之洞电令施南文武各官，赶紧查拿滋事人犯，先后捕捉30多人。经过审讯，最后把为首之向燮堂、向元新等10人判处死刑，崔春生虽已死去埋葬，亦被挖出戮尸；另外赔银14万5千两^④。同年12月，京山富家田广禄与举人之子贺清相聚众千余人，将教民房屋及教堂拆毁；1906年夏，利川县无数群众拥至法国教堂，将监督1人、神父1人、教民2人同时杀毙，并把一名神父拘押，烧毁天主堂三间。1907年4月，蒲圻县羊楼洞地方，圣公会和天主教各拥众数百人，互相殴斗，当场互毙10余人，伤数十人。同年6月，陈姓捣毁圻（浠）水巴河镇教堂，不久，下巴河镇的福音堂，亦被陈麻木纠约多人，将堂内什物捣毁一空^⑤。20世纪初教案连续发生，反映湖北地区民教矛盾仍然相当激烈。

（三）

湖北的教案是全国教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教案的发生，还直接受到邻省反教会斗争的影响。但是，湖北教案，终究是在湖北这个特定环境下发生的，除了带有全国的共性外，不可避免地又有本身的特点。综观19世纪的湖北教案，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自发斗争占主导地位。如前所述，近代的湖北教案，东起广济、黄梅，西到利川、

巴东,西北波及鄂西山区,南到蒲圻羊楼洞,范围几乎遍及全省各地。但自始至终,自发性的反抗斗争一直占着主要地位。60、70年代的所有教案,90年代的宜昌教案、麻城教案、圻春教案、广济教案、黄梅教案、利川教案以及20世纪初的教案等等绝大多数是群众自发的反教斗争,这些斗争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缺乏组织领导,仅仅是为了反抗洋人入侵,或发泄对洋人为非作恶的忿恨以及对洋人暴行的反击。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湖北人民这种爱国精神及不屈不挠的斗争气概,还是应予肯定的。

二、在广泛自发斗争的基础上,开始出现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反教斗争。随着群众反教会侵略斗争的扩大与发展,随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湖北的反教会斗争发展到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反教会的秘密组织,并且提出了带有纲领性的政治口号。如1898年的长乐反教会斗争,在湖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反教斗争。这次斗争是由以向策安、李策卿为首的海潮会(即哥老会)领导的,而且打出了“灭洋”的旗号^②,具有较明显的政治目的。同年夏,长乐覃培章的反教会起义,也提出了“保清灭洋”口号^③。1900年7月,枣阳南乡群众百余人,大张“顺清灭洋”旗帜,掀起反侵略斗争^④。不同的地区,同时提出大同小异的口号,是民族危机加深、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反映,标志着湖北反教会侵略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纯粹自发的反抗开始向自觉的斗争转变。

三、分布地区广,规模逐渐扩大,反抗斗争日益频繁。湖北教案延续了30多年,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869——1890年,这21年间,全省共只发生4起教案;第二阶段为1891——1900年,10年间共发生18次教案;第三阶段为1901——1907年,计发生了6次教案。由此足以证明高潮是在19世纪末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年代,它与全国反帝斗争高潮是相互呼应、同步进行的。再从这些教案的分布地区来看,东部有广济、黄梅、圻春、浠水等县,西部有宜昌、施南、利川、长阳、巴东等县,西北有襄阳、枣阳、谷城、光化,中南部有武昌、孝感、天门、京山、蒲圻等处,范围几乎遍及全省各地。从每次斗争的规模来看,60、70年代参加反教斗争人数每次不过几十人,最多几百人;而19世纪末,如长乐教案号称万人以上,至少也有4、5千人,武穴、京山教案各有千余人,其规模明显在不断扩大。

四、反教会斗争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地方士绅。从湖北历次反教会侵略斗争的领导人看,有些并无领导,纯粹属于自发反抗,而大多数斗争的发动或领导人则是地方士绅。如,谷城反教会侵略的领导人刘正起是保正,陈立端是拥有一百六七十亩田地的秀才;扒毁黄龙荡教堂则是由士绅朱广林等多人发动的;响应余栋臣起义的长乐领导人向策安是秀才。焚毁广济教堂的领导人张兰亭是武生,襄阳城内教堂、电报局的捣毁受到知县李祖荫和绅士的支持;京山教案为首的是当地富家田广禄和举人之子贺清相。这些地主士绅之所以能参加到反教斗争中来,其原因有三:第一,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愿意自动放弃统治权利;而自从教会势力侵入湖北以后,中国人“一入教民之列,有司即不能过问,甚至朝对簿以陈词,暮分庭而抗礼”。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官绅的权力。而且传教士对内政的干涉,引起了官吏的很大不满,如广济知县德廉说:天主教“弃毁神主,是无父也;不服官管,是无君也。……而又猖狂若此,卑职如任其所为而不究,则王法不行,流弊不可胜言”^⑤。这充分表达了许多官吏对传教士的不满,并要求改变传教士干涉内政现状的共同呼声。第二,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犯。教会深入内地以传,大肆掠夺霸占田地房屋,而地主、绅士则是大部分房屋、田产的主人,这自然会引他们心中的惊惧和愤怒。第三,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封建传统、封建礼俗有许多冲突之处。如不拜天地,不敬祖宗等,官绅们害怕教会入侵后伤害地方的人心风俗,破坏旧的传统,因而他们一般对洋教是深怀不满的。尽管他们的目的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们的行动却推动了全省

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作用。

总之，西方教会势力进入湖北以后，由于人们对“洋教”的陌生和传教士的种种罪行，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和愤怒。这种不安和愤怒，就是教案接二连三发生的温床。60、70年代，人们多半由于对远来的陌生人不了解，常常自发地进行反抗。进入90年代，传教士在各地犯下的种种罪行，已经揭破了他们的伪善面目，从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情绪，反教会斗争因而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并且出现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这些大大小小的教案和起义，最后总是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以赔款、道歉、杀害无辜百姓、贬责下级官吏、损害地方权益而告了结。可是，清政府的抑民媚外政策，虽然可以得逞一时，却无法平息人民的反抗怒火，往往反而激起人们的更大愤怒，以致斗争愈演愈烈，教案此伏彼起。这些斗争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被镇压下去，却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显示了湖北人民的崇高爱国热情和反抗高压的坚强毅力。

注释：

①⑧⑩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沈垌天主堂罪恶史料汇编》（稿本）。

②④ 《武汉指南全编》宗教，第1—4页。

③ 转见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86页。

⑤⑧⑨ 华中师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第3—4页。

⑦ 见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278页。

⑫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页。

⑪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6，第30—42页。

⑬⑮ 李刚已辑：《教务纪略》卷3下，第23、5页。

⑭ 徐家干：《教务辑要》卷4《随州教案纪略》。

⑯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56页（中译本）。

⑰ 斯汀生：《远东的危机》第154页。

⑱⑲⑳ 《清季教案史料》：《英驻汉领事照会江汉关监督李文稿》、《江汉关监督李来文》、《英国林卫二牧师在武昌被吸案》。

㉑㉒㉓㉔ 《湖北通志》卷53，第1437—1439页。

㉕ 《清史稿》卷159，第4646页；《湖北通志》卷53。

㉖ 《张文襄公全集》卷49；《湖北通志》卷73。

㉗ 《时报》丁未（1907）6月17日、25日。

㉘ 《张文襄公全集》卷49，第18—19页。

㉙ 《格致益闻汇报》44号，第一册，第350页。

㉚ 李杕：《拳祸记》下册，第400页。

㉛ 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349—350页。